

李慶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顧千里研究

顧廷龍題



李慶著

顧千里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顧千里研究

李慶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昆山兵希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5.5 插頁 2 字數 331,000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0225-2
Z·13 定價 7.60元

序

清代乾、嘉之際，考據之學大盛，凡當時學術上稍有名望者，幾無一不與考據學有某種淵源。一時名家輩出，蔚為清代學術界之一大特色。

考據學者反對宋、明以來游談無根、主觀臆斷的空疏議論，而強調無征不信、實事求是的務實精神，這就要求考據的結論必須建立在大量原始的、確鑿可靠的材料基礎上。時代固求其愈早愈佳，內容則必求其翔實可靠。而古籍經過長期寫刻流傳，散佚訛誤固在所難免，當時段玉裁提出了“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斷其立說之是非”的議論，認為古籍非經校勘整理則不足以定底本之是非，未能審定底本之是非則不足以言立說之是非，由此可見清代學者對校勘之重視程度。于是學者們鉤稽索引，爬羅抉剔，無不致力於材料的搜輯整理，公私諸家輯刻古籍之風亦因而大暢，而輯佚、校勘之學遂成為考據學重要之組成部分。

由于校勘本身對考據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得到當代學者的普遍重視，當時遂有終生從事于此而卓然以此名家者，顧千里即為其中之代表人物。千里從小博覽羣書，潛心向學，經史、小學、天文、歷算、輿地等學，無書不讀，為日后從事校勘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學術基礎。而其所處之江南吳中地區，適為清代藏書家薈聚之中心，舊刻名鈔，所在多有；其所交往，亦多一

時名流學者，切磋深討，相互啓迪，在客觀上爲其提供了一定的物質條件。

顧氏一生，所校圖書不下一百六七十種，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各部，其校書所涉範圍之廣，實爲歷代校勘家中所僅見。襲自珍在《己亥雜詩》中稱贊他：“劉向而後此大宗，豈同陳晁競目錄！”葉昌熾在《藏書紀事詩》中則說：“誤書細勘原無誤，安得陳編盡屬君！”對他在我國校勘學史上的地位，都作了充分肯定。

對這樣一位在校勘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學者，第一個爲他撰寫年譜的是日本漢學家神田喜一郎。一九二六年，《國學月刊》發表了他撰寫的《顧千里先生年譜》的譯文，由於是初創，內容顯得不够充實；陳乃乾爲此作了“補遺”，增加了若干材料。一九三〇年，汪宗衍根據涵芬樓收藏的顧千里校本加以補充，撰成《顧千里年譜》，發表在《圖書館學季刊》上，材料稍有增加，但內容仍嫌簡略。同年，趙詒琛根據顧氏生平事跡及交游作了較多補充，撰成《顧千里先生年譜》；嗣后又根據王欣夫先生提供的資料進行了增補，于一九三二年刊入《對樹書屋叢刻》，這是我們目前能够看到的較好的一個本子。

李慶同志長期從事對顧千里的研究工作，從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地各大圖書館和私人收藏的顧氏校本中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參閱了文集、方志、碑拓、尺牘、筆記等三百餘種，鉤稽研討，從中發掘了不少前人從未注意到的資料，尤其對顧氏早年的活動情況和他的交游作了較多的補充，從而勾勒出了他一生思想發展的脈絡。對顧千里的校勘成果，本書作了較爲深入、詳盡的考訂，論述了這些校本的校勘根據、校勘過程及其以后的流變情況，爲進一步了解顧氏在校勘

學上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材料。

本書還對前人論述中的某些問題，如顧千里與段玉裁相識的時間、兩人在爭論時來往書札的次序等進行了考訂，糾正了一些錯誤的論斷。同時對顧千里與段玉裁、黃丕烈之間所以發生爭論的原委，進行了一些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些，對了解顧千里的思想發展過程，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李慶同志的這本書，通過對顧千里生平的排比整理，不僅對研究顧氏本身提供了比較完備的資料，同時通過對顧氏交游的敘述，對研究嘉、道時期吳中地區學者之間的關係及學術流別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它的出版，將對進一步研究顧千里的生平和他在校勘學上的成就，起積極的推動作用。

徐 鵬

一九八七年八月于復旦大學

前 言

顧千里(1766——1835)，名廣圻，號澗養，以字行，江蘇元和(今吳縣)人。他是我國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著名學者，經學小學，天文地理，詩賦詞章，金石碑版俱有所長，尤精于校勘之學，被譽為“清代校勘第一人”^[1]。他校刊的典籍，廣為流布，沾溉后世；他的丹黃遺冊，被奉作書苑球璧，珍藏秘府；但他本人，却還有不少事迹未顯于世。這是一位在清代學術史、中國古典文獻學、中國文化史研究中應當予以重視的人物。

—

乾嘉時期，清朝的政權業已鞏固，進一步加強了思想文化上的專制統治。乾隆皇帝號稱“稽古右文”，刻石經，修《四庫》，提倡考據，而又在士人的頭頂揮動“文字獄”的鎖鍊。當時江南地區，承數百年經濟文化發展之餘緒，呈現出發達的景象，成為學術文化中心。“乾嘉以後，刻書之風盛行”，而其名家，“皆在大江以南”^[2]。江南地區的藏書家，更是不勝枚舉。

顧家世代為醫，千里從兄顧之達是乾嘉時著名吳中藏書家。家庭的薰陶和大量的藏書，使他得以博覽羣書。他又是江聲的高足，惠棟的再傳弟子。曾師事錢大昕，得到過段玉裁的指點。這樣的師承關係對他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無疑有

着很大的影響。他交遊廣闊，和孫星衍、張敦仁、阮元、秦恩復、吳翊、顧藹、王引之、洪瑩等人頗有交往，得到他們的提攜和幫助。此外，他的友好，如戈襄、鈕匪石、袁廷禱、黃丕烈、瞿木夫、嚴元照、李銳、臧在東等，俱爲一時俊選。友朋間切磋琢磨，相互影響。

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造就了顧千里，造就了他的校勘學。

二

顧千里的主要成就在古典文獻學領域，在校勘學。他一生整理的古代典籍之多，校書之勤奮，令人贊嘆不已。他在校勘學理論和方法上的建樹，尤爲人稱道。他提出校書須“去鑿空騰說之損，收實事求是之益”；主張吸取“宋學”主靜主敬的思想，運用到“漢學”“實事求是”的治學中去；這在當時“宋學”、“漢學”門戶之見甚深之際，有其可貴之處。他主張校勘必須和目錄、版本之學相結合，校勘須精通文字、音韻、訓詁；校勘須注意全書義例，具有識見。他強調的校書須有根據，標明出處；校書要“以不校校之”，不可輕改原文等理論，可以說在今天已成了古籍整理學科中的基本原則。他在長期實踐中運用和總結的一整套校勘的方法，成爲我國校勘學的寶貴財富。

顧千里畢生從事古籍整理，進行校勘，因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和特點。具體而言，有如下數端：

一，顧千里與其說是一個專門研究古籍的學者，不如說他更多的是以校書爲職業，爲謀生的手段。他之所以終身從事丹鉛，很大程度上是爲生計所迫。這和乾嘉之際的其他校勘學者，如段玉裁、王念孫、錢大昕等人是不同的。他沒有這些

人那樣悠閑，可以隨自己的學術研究和愛好來決定校理典籍的內容和進程。由此便決定了他校書範圍博大。不是偏專于一個領域，耕耘于一隅之地，而是經史子集，旁及各類，是一個博涉派。這是一個主要的特征。

二，在校勘時，他特別強調要收羅衆本，辨明版本源流，講求不同版本的互勘。堅持校勘要有版本根據。從校勘的方式上來說，他屬於“版本派”。

三，顧千里從事校勘，但他並不滿足于一般的典籍整理，而且注意從具體的校理工作中，抽象出規律性的東西。顧千里雖然沒有留下一部完整的校勘學專門著作，但在他的那些題跋、校勘記中，常常可以看到閃光的理論性歸納，而這正是我們應當進一步加以研究的。^[3]

顧千里的成就，又不僅僅局限于校勘學領域。如在經學中，他強調《詩經》的箋、注不當混淆；對《禮記》中有關周代學制的獨到看法；在小學中對《說文解字》的研究，對《釋名》義例的闡述；在史學中，對《資治通鑑》中有關地理的研究等等。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在清代學術史、清代文化史中，他應當有自己的地位。

三

“讀書貴經濟，經濟又貴用而不貴言。”^[4]“他日倘出仕，當上不負國，下不負民，終于不負所學而后止。若肥身家，保妻子，從時自媚，不危言危行者，共絕之！”^[5]讀着這些熱血奔突的豪言，你腦海中會浮現出一個怎樣的形象呢？顧千里在人們的印象中，更多的是一個斷斷于校勘之役的“萬卷書生”，是一個心如古井的儒者。但是，誰又能說，在他的血管中沒有熱

血在奔流呢？

顧千里在青年時，是一個很有濟世抱負，志在騰飛的人物。看看他的老友戈襄所寫的《贈顧子遊序》，便會深切地感觸到這一點。但人的思想是變化的。時代的潮流，人生的際遇，生計的奔波，磨滅了他的理想之光。他漸漸地沉寂了，現實了。爲稻粱謀的實際境況，迫使他惶惶于校勘之中。歷史就這樣捉弄人，一個認爲讀書當“貴用”的人，偏偏就要讓他爲他以爲不當“貴”的他人之“言”而耗費一生。這未始不是一場悲劇。

顧千里還是一個個性強烈的人物。喜笑怒罵，率性爲之。遇事講求理性，不拘泥于情面。他與先輩如段玉裁、劉鳳誥等人的爭執，與友朋黃丕烈、李銳等的牴牾，大抵多與此有關。關於顧千里的爲人性格，前人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說法。有的人認爲他剛愎自用，好輕詆人，故多與人爭執；而還有的人則說他進退舉止粥粥，詞色嫵煦平和。現在看來，這二者都存在着一些片面性，他們刻畫的，都只是顧千里的一個側面。年輕氣盛時，閱世頗淺，遇事据理力爭，頗有意氣之舉。而年歲增長，閱歷漸深，生活的波濤，沖刷了身上的棱角，便漸趨沖虛平和了。從一個銳意進取、鋒芒畢露的青年，到一個平和可掬的碩儒，最后在貧病交困中死去，這中間，我們不是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影子嗎？

還要提一下的是，顧千里一個最大特點，便是他的真誠。吳肅說他“終不欺人”^[6]，李兆洛也說他“唯無自欺，方無書欺”^[7]，細細品味他的一生，確實可以領略到這一點。

四

有關顧千里的生平記載，現可見的《墓志銘》有二個。一

爲夏寶晉所撰，一爲李兆洛所撰。爲顧千里作年譜的，最早是日本老一輩的漢學家神田喜一郎。國內曾有幾種譯本，陳乃乾氏嘗略作直補。汪宗衍氏又復撰之。而后，趙詒琛氏再次重撰。趙氏之譜先后刊布過二次。先由金山姚氏刊布，稍略；后趙氏又再增補刊行。這最后一種，吸收了前人成果，最爲細密。

前人對顧千里生平的研究，筆路藍縷，功不可沒。但是，也無須諱言，其中有不少問題還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比如，他們對於顧千里思想發展的脈絡，勾勒不清，尤其是早年的濟世思想和事迹等，多未涉及。又比如，對於顧千里一生較有影響的和段玉裁爭論的始末，和黃丕烈之間的關係，由甚爲親密到最后交絕的原委，俱未能究明。再比如，有大量新發現的資料，舊譜中俱未予採用。此外，顧千里的交遊、行迹，還多有可補訂者。因此，筆者不揣淺陋，以數年之力，遍及南北各大圖書館，收羅尋訪，爬梳剔抉，略事攷訂，成此新譜。我主要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一，根據收集到的各種新材料，對顧千里的生平事迹作了較大的補充。

二，對顧千里的師承交遊，廣事攷訂，從各種方志，詩文別集，說部筆記等資料中，彙集了不少不見于史傳的人物事迹，使我們對顧千里的交往狀況，有較明確的認識，對當時整個學術界的相互關係狀況，有所了解。

三，對顧千里所校的各種書，在可能的條件下，攷明其所用的版本，勾勒其校勘的具體過程，使大家對顧千里的校勘學，有更明晰的認識。

四，對於顧千里生平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上文所提及的

那些問題，略作攷訂，力求能勾畫出其發展的始末，以及相互的關係。

五，對於前人所作諸譜中的訛誤之處進行了辨證。

《顧千里校書考》將顧千里所校之書的原委和流布狀況，作一考察，以期對顧千里的校書情況能有一系統的研究。

最后我這部《顧千里研究》的寫作，首先應當感謝我的導師徐鵬先生對我的指導。他不僅確定了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以顧千里為研究對象，並慨然將已故王欣夫老先生的《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手稿示我閱讀，還曾介紹我去謁見請教謝剛主老前輩，對我多有指導。成稿以後，先生又在百忙中看過我的稿子。

還應感謝老前輩呂貞白先生，當時他得知我寫作此書後，熱情地給我以指點，并囑我曰：此人是很值得研究的。他還介紹我給黃永年先生寫信，收集有關資料。遺憾的是，呂先生已無法見到此書的出版了。而陝西師大的黃永年先生，我當時毫不相識，冒昧給他寫了信。不意先生在百忙中，慨然將珍藏的顧千里手書題跋抄錄寄我。章培恆先生對我也多加關照，曾多次問及此書的情況。顧起潛先生也多加指點，并蒙惠題書名。對於師長對我的指點和幫助，我由衷地表示深切的感謝，并將永遠銘記在心，作為鞭策自己不斷努力探求的動力！

此外，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揚州市圖書館等單位，都曾將善本圖書惠借。我的同窗好友孫猛、王鎮遠諸同志，也對我多有幫助。在此一并表示謝意。

【注】

〔1〕見神田喜一郎《顧千里年譜》及日本平凡社版《大百科事典》顧

廣圻條。

[2] 傅增湘《雙鑒樓藏書續記》卷下。

[3] 關於顧千里校勘學，拙作有《顧千里校勘學初探》，其中部分章節已發表于《復旦學報》1984年第3期，和《古籍整理與研究》第二期，請參閱。

[4] 見戈襄《半樹齋文》卷七《思適軒記》。

[5] 同上書，卷十《贈顧子遊序》。

[6] 見《思適齋集》卷十三《西園感舊圖序》。

[7] 見《養一齋集》卷十一《顧澗菴墓志銘》。

目次

序 (徐鵬)	1
前言	4
新訂顧千里年譜	1
附：顧千里傳記及有關資料	
顧千里校書考	291
顧千里題跋書目考略	439
顧千里著述目錄	447
顧千里佚文輯錄	450
徵引文獻目錄	473

新訂顧千里年譜

敘 例

一，本譜所收材料以與顧千里有關者爲限，列舉事實，不加評論。

二，本譜繫年，採用舊曆。一年之中，凡月份不可考之事蹟，則次于是年之末；凡推定爲某一時期之事蹟，則次于此時期某年後，於注釋中說明。

三，凡引用材料，一律標明出處，以便讀者查檢。凡採納他人之成果，亦一律于注釋中說明，不敢掠美。

四，所取材料，多有出自《思適齋集》及《思適齋書跋》者。爲行文簡略，凡出此二書者，一般僅標明卷數，不再抄錄。

五，書中凡涉及顧千里親屬、師承、交遊，其人于正史中有傳者，除個別因傳文過略而稍事直補外，一般僅標明卷數，以免繁冗。前人所撰《墓志銘》及《年譜》，則著錄其目，以便翻檢參閱。凡正史未見其傳者，則或尋方志，或錄他人詩文，以彰行蹟。

六，後人有關顧千里的傳記材料，如墓志銘等，一仍趙詒琛氏《顧千里先生年譜》例，列於譜文之後。

七，顧千里校書甚多，凡校一書，多以數本互勘，且參以他書，故常有所舉爲同一書名，而實爲不同校本之情況。爲便于

讀者了解他校書所採版本、校書過程及校本之流布狀況，筆者不揣淺陋，將所見草成《顧千里校書考》，次于《年譜》之後。而《顧千里題跋書目》，《顧千里著述目錄》附焉。

八，在收羅顧千里材料之際，略見有遺文爲《思適齋集》，《思適齋書跋》所未收者，稍事排比，次于書後，以備讀者翻閱。

九，最後附有全書徵引文獻目錄，所舉僅爲主要者。其中除鈔本、校本等外，一般不注明版本。又，凡本書引用時有略稱者，如《思適齋集》稱“《集》”，《思適齋書跋》稱“《書跋》”等，則於書目後標明，以供查對。

十，本書採用新式標點，標點符號用法一仍常例。文內括號中文字，除標明“原注”者外，俱爲筆者所注。

年 譜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丙戌,一歲。

八月,顧千里生。江蘇吳縣人。父名文燿,字庭有,時年二十七歲。母鄭氏,時年二十一歲。[-]

顧千里名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養。其一生中所用署名、別號、印鑑甚多,現據所見,彙錄如下[二]:

署名、別號:

思適居士 見《百宋一廬賦》、顧千里手校《古文苑》卷九。

間蘋居士 見北京圖書館藏《顧氏藏墨》。

鑑平 見《藝圃藏書題識》卷三《吳地記》條。

一雲 見王欣夫先生校《思適齋集》卷十六。

一雲散人 見顧千里手校《唐文粹》卷九。

一雲老人 見顧千里手校《唐文粹》卷九十七。

牛背散人 見顧千里校跋《衢本郡齋讀書志》。

無悶子 見《遜翁苦口序》、顧千里手校《唐文粹》書尾。

千翁 見顧千里手校《歐陽行周集》卷五。

印鑑:

顧廣圻印 白方。見顧千里校《中論》。

顧千里印 朱白方。見顧千里校《復古篇》、顧千里撰《釋梧溪集訂譌》稿本。

顧廣圻 白方。見顧千里校《道藏目錄詳注》。

千里 朱方。見顧千里校《金石後錄》。